

# 报刊史研究的路径、方法与视野(笔谈)

**编者按:**近代报刊不仅是资讯的载体,还是西学氛围下开启民智的重要媒介,且承载了文人论政的言说方式。在研究思路上,应将报刊视作载体,而不局限于报刊内容的分析。报刊作为载体,其本身有经营与销售等问题。报刊活动也可视作资讯传播,所谓传播则属于行为科学的研究范畴。传播不等于写新闻,不能仅仅拘泥新闻文本上的遣词造句等。传播涉及内容,又与技术相关。由此看来,考察近代报刊不仅涉及报刊的文本,诸如语言、概念、文体等,还涉及媒介议程与社会议程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进一步又涉及文化研究的理论与路径。报刊史研究是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也是当下学界探讨的热点。本刊与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合作,于2010年开设“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专栏,旨在为学界提供交流的平台。该专栏得到学界的厚爱,刊发了一批专题论文。本期约请复旦大学黄旦教授、苏州大学朱从兵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或从传播学或从历史学出发,对报刊史研究思路进行讨论。希望同仁赐教。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6-0096-10

## 报刊是一种交往关系

### ——再谈报纸的“迷思”

黄 旦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某个湿漉漉的“周六晚上”,“一个年轻人坐在长长的藤制躺椅上看报纸。他已经看得入神了。那时而愤怒时而微笑的表情说明这则故事是多么地吸引着他。他一页页地翻着报纸”,突然一个“穷困的流浪汉因风雨日晒病死道旁”的标题映入眼帘,“这个年轻人被这篇简短的报导所感动。他可以想象那个可怜人倒在路旁濒临死亡时所受的痛苦……有时他感到体内涌起一阵爆裂般的怒气,到了下一刻他又感觉怜悯。然而另一刻他的愤怒又指向产生这种贫穷,却让一小群人致富的社会体制”。这是《黑色三宝垅》小说的情节,安德森借此说明,这个读报入神的年轻人,不仅为报纸内容所打动,更重要的是通过报纸的铅字,想象到了自己

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是一个初生的印尼的‘想象共同体’的一员”<sup>①</sup>。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到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内中写有吴江贾氏三兄弟,由于不知时论为何物而科举落榜,受人指点接触了报纸(主要是上海报纸如《申报》),顿时眼界大开,对外国人的文明新器具(如洋灯)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凡有所见,无论用途如何,必定千方百计搞到手并堆在屋里。即使如此,仍心不甘,因未能亲历上海见过世面。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心底的渴望,怀揣银两,壮起胆子,躲过再三阻拦的母亲,趁着夜色兴冲冲坐船私奔黄浦江<sup>②</sup>。报刊恰如一道飞虹,贯通了吴江和上海,形成了一个都市共同体,从此其命运和都市就牵连在了一起。

<sup>①</sup>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2页。

<sup>②</sup>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十四回“解牙牌数难祛迷信 读新闻纸渐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两个故事不一,却有其内在的一致,揭示出报刊不是像我们现有研究中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个容器——装载不同内容,实质上,它更是一种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看,列宁把报纸比成党组织的脚手架,称为“集体的组织者”<sup>①</sup>,倒也是很贴切的。

当然,按照一般的理解,也可以把此看成报刊的一种功能。然而,同样作为印刷媒体,同样可以造就共同体,书籍与报纸就不同。从源头看,“书籍起源于讲演、独白,尤其是起源于诗歌和歌咏”,“书籍的源头是抒情的和宗教的情感。相反,报纸的源头是世俗的、日常的东西,它来自于私信,私信又来自于交谈”<sup>②</sup>。由此造成了内容上的差异,用威廉姆·詹姆士的知识类型区分,书籍代表的是“理解型”(knowledge about)知识,而报纸属于“感知型”(acquaintance with)知识<sup>③</sup>。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就依此以为,从总体上说,新闻涉及的是孤立的事件,并不打算从因果形式和目的论的次序来追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一般不关注过去或将来的因素,除非与现时事件有关联。新闻意在使人们和社会熟悉实际的世界,以此保持个体心智正常和社会有序。所以,新闻的价值是实用而不是欣赏,专注于那些带来突然和决定性变化事件是其独特个性。公众对之的第一反应,就是相互转告。新闻就是这样的一种“公共记载”<sup>④</sup>。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其内容不同恰是因为它们本身作为一种媒介的形式不同,是形式决定了内容而不是相反。帕克所谓的不关注“过去”,不从“因果”形式和“目的论的次序”来追溯事件之间的关系,除非是与“现时”有关,其突出的正是报纸独有的“时间”。用安德森的话说,报纸有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同时性:这不仅成为其

内容挑选和排列的合法性依据,同时也造就“天涯共此时”的印象,从而“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几乎分秒不差的同时消费(想象)”。“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sup>⑤</sup>时间改变了空间,空间的如此联结,又使人感受到不同往常的“报纸”时间。如果书信交往的社会学特征是内容客观、固定,便于公开而又想保守秘密的奇特对立之汇合<sup>⑥</sup>,那么,现代报纸交往的社会学特征,就是同一时间的知识和思想之分享。这种不同不是因为内容,也不是因为阅读后导致的效果,而是由报纸和书籍的不同形式所确定。如同托克维尔说的:

因为每个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驱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sup>⑦</sup>

或许这里同样可以用得上麦克卢汉的隐喻——“媒介就是讯息”。不过麦克卢汉虽然揭示了媒介的尺度对于人类思维方式和认知空间的规定性,并且因此发现了“人体的延伸”,但最终还是止步在了感官和触觉的层面,没能顺此而下,牵扯出“延伸”就是空间关系的改变。更没有发现,正是因了报纸的交往和关系,改变了现代报纸产生之前的旧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形成了不同的新的共同体,用法国作家乔治·桑的说法,“每分钟都提醒我们是生活在

① 列宁:《从何入手?》,转引自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②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③ James, W.,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 1, 1904, pp. 477-491, <http://psychclassics.yorku.ca/James/consciousness.htm>.

④ Park, R., *Society*, NY: The Free Press, 1955, pp. 71-81.

⑤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第33~35页。

⑥ 齐美尔:《关于书面交往的附录》,《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75~277页。

⑦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42页。

一个集体之中”<sup>①</sup>。绵延至今的公众意见、“公共领域”乃至“公共新闻业”等讨论,正是立足于这种关系层面。“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sup>②</sup>,报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容器,“只供通过,不供活动,目的仅在于流动”<sup>③</sup>。假若媒介真的是“讯息”,那报纸首先就是“交往和关系”的“讯息”。

当现代报刊作为“新知”传入中国时,无论是传教士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感到了“交往关系”的紧张。就传教士而言,搭建新的交往桥梁消除“华夷”之隔,首先面临的是中国固有的交往方式和传统。因此,“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成为首选的叙述框架。同时,叙述方式、论证依据、刊物开本等都趋向中国式。这不能只是被看成一种吸引中国人看的策略和手段,毋宁说是中外之间两种不同交往方式的互动和渗透。然而,洋人们对于二者之不同是十分明白的。试图以“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sup>④</sup>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次以“新闻”的名义,向中国人描述了“新闻纸”的概念和历史:从“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到“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议论诸事”<sup>⑤</sup>,活生生勾勒出民间刊物的画像。1853年的《遐迩贯珍》,则是第一次把中国的邸报与西洋的报纸做了区分:前者只有上谕奏折——隶属于朝廷的举动大略;后者,内备“各种信息”,而且可达平常人家,一有要事,顷刻间四方尽知其详<sup>⑥</sup>。官方交往和民间交往由此截然而别。十里洋场的《申报》,则是要彻底划出自己与中国旧有邸报的界线:在内容上,邸报只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新报则是“上自朝

廷下及闾里……备书于纸”;“邸报之作成于上”,由上而下,新报之类则“作成于下”,来自民间。此种信息来源的不同,导致读者构成了变化。阅邸报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不如外国这些报纸,“人人喜阅”。邸报的目的是“备史臣之采择”,为官吏做素材,《申报》这样的报纸,“如太史之陈风”<sup>⑦</sup>,以反映社会之情形。总而言之,新旧之线,恰来自对不同群体及其所勾连的关系的确认和想象。

因此,报纸是一种关系。与宗教不同,它代表的和调节的是此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始终是构成式的,自然也是动态的和历史的,特别是由于报纸与政治的难分难离,必然随着地域、民族、党派等等因素的影响而波动。报纸对于这种关系理解如何,或者说其抽象程度和普遍性如何,与报刊的传播及其功能息息相关。不知有多少人知道,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与其政治文化转型,尤其是选举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当新闻业向职业团体转化时,他们原有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随之产生根本性变化。在内部,他们自认为是一个职业团体的成员,从此再不是党派的擂鼓助威者;在外部,他们和自己的读者,而不是他们的出版商或者出版商所支持的政治党派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新闻采访、客观性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及其关系转化中相继产生。然而,当美国新闻业基于政治改革的背景脱离了党派意识形态时,欧洲并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没有可资比较的政治变化。欧洲大陆的新闻记者更多是把他们自身看做高雅的文学创造者和具有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家,而不是美国那样的专业“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要提升自我,那必定是在文学素养上,而不可能是在专业主义理念上。甚至当美英两国的新闻业已经形成明显的事实导向时,法国的

① 转引自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从狄德罗到因特网:法国传媒史》,施婉丽、徐艳、俞佳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② 齐美尔:《社会学的问题》,《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③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4~15页。

④ 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影印本导言》,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页。

⑤ 《新闻纸略论》,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第66页。

⑥ 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714页。

⑦ 《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新闻业仍然是以文学形象和文学热忱为主导<sup>①</sup>。不同的自我想象,自然就构成不同的交往关系。报纸及其实践范式,也就不可能独此一家固定不变。梁启超说:“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sup>②</sup>暂且不管这样的划分是否合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以何为利益——固定的立足点,自然也就决定了其空间视野及其关系之构成。恰如齐美尔所说,功能和空间互为关联,功能可以使空间对象固定化。只不过这种确定性,并“不像一个实质的对象物的固定化——人们总是重新发现实质对象物在原来的同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转动点的真正在理念上的固定化。这个转动点按照一定的距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把各种要素牢牢地凝聚为一个体系”。理念如何固定,转动点也就在何处停留,新的空间及其关系随之再一次形成。交往形成的相遇,“不再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摩擦,而是意味着一种力量的相互补充,因而意味着力量的增加,力量的增加需要并且因此也产生着一个空间的支撑点”<sup>③</sup>。简而言之,功能是交往和关系的功能,功能可以凝聚新的关系构成一个关系的支撑点,同时又是对旧有空间关系及其支撑点的破坏和摧毁。换用海德格尔的表述,我们的交往是从某些共同的假定形式出发,并正是借助于这样的假定形式,使得表达符合“命题的真实性要求或者规范的正确性要求”,并且具有了实际意义。因此,“在某个规范语境中适用于某个行为的正确性意味着:人际关系作为社会世界的合法组成部

分得到了认可”<sup>④</sup>。依循这样的思路,梁启超的“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云云,就显示出其内在的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意涵。

无疑,关系是借助于对象的,并且只有通过对象才存在。但是,关系就是关系,不能化约或还原为对象<sup>⑤</sup>。值此,中国报刊史的研究,需要转变自己的视野,从“工具”,从“工具”被谁使用的历史,从容器式的内容呈现或者建构中暂且脱离出来,跳出福柯所批评的那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历史时间观,即“一种系列的、定向的、累计的社会时间,发现了一种‘进步’意义上的进化”<sup>⑥</sup>,把注意力放到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其“共同的假定形式”是什么,来自何种“合法性”,这种“关系”与其对象之间有何种缠绕,与另一种“关系”又是如何构成关联,此种关联被何种因素所激发,由此带来报纸内容和形式的何种变化等等,从而为我们的报刊史书写开辟出一个新的路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sup>⑦</sup>这段话我们耳熟能详,现在应考虑如何运用于中国报刊史的书写之中。

关于报纸的“迷思”,我在今年第2期的《新闻大学》上发过一篇文章<sup>⑧</sup>,在最后曾就如何认识报纸提出了三个维度的设想,因限于篇幅草草收场,现借此机会,就其中的“报纸交往关系”稍作展开,以就正于方家。说来也巧,在写作本文时,应备课之需,把沟口雄三的《公私》重又读了一遍。沟口先生认为,中国的

① 参迈克尔·舒登声《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业》第三章,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

②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本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③ 齐美尔:《空间社会学》,《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编译,第302~303页,305页。

④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卷1,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

⑤ 参安德鲁·赛雅《空间的重要作用》,载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66页。

⑥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⑧ 黄旦:《报纸的“迷思”——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

“公”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相连的公”,“基本上是以民间社会的私关系为基础的公共性”。因而,他在最后做了这样的总结:“对中国,整体不应以国家、社会等等场的意象把握,而应作为关系拓展的意象把握;同样,个体也应作为关系的结点,放在关系中把握,才最接近实际情况。”<sup>①</sup>若依照这样的脉络来观照报纸,我们说报纸是一种交往关系,除了就一般的媒介形态而论外,对于中国报刊而言,恐怕还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自身特殊之意义,是可以放到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sup>②</sup>层面,亦即我在《新闻大学》那篇文章中提及的第三个维度来进行考量和分

析的。不过,这只能是下篇文章的事了。

我曾经在不同地方说过,这里重申:呼吁转换报刊史研究的视野,不是否定既有的研究,而是希望有更多新的想象和创造。历史都是当代史<sup>③</sup>,如果克罗齐的这个说法有其合理之处,那么,不同的时代应该产生不同的报刊史。我不赞成重写报刊史,“重写”二字让人感觉充满傲慢,学术研究不可能独此一家;我期盼的是有多种报刊史,“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个学科或者学术领域才有欣欣向荣的可能。因此,本文所谓的“关系”,并不是要取代什么,更准确地说,毋宁是想提供另一种选择。

## 作为“新闻史”、“文化史”和“媒介史”的报刊史研究

朱从兵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长期以来,报刊史是作为新闻史的一部分来研究的,而对近代特别是晚清新闻史的研究多侧重于报刊史。卓南生说:“我个人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815年到1874年之间的这段断代史,也就是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源头。”<sup>④</sup>戈公振认为:“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sup>⑤</sup>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我觉得在新闻史范式里研究报刊史,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近代报刊究竟是如何获得新闻和供给新闻的?供给新闻的目的是什么?供给新闻的效果如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必考索新闻概念及形态呈现的方式、路径等。

“新闻”的形态可以是观念,可以是消息,也可以是知识或常识。观念的“新闻”供给,可称为“宣传”;消息的“新闻”供给,可称为“报

道”;而知识或常识的“新闻”供给,可称为“介绍”。当然,新闻供给可以是几种形态的结合或综合,也可以某种形态为主,或以某种形态为特色,报刊因之而分成了几种类型。办报人对“新闻”形态的选择,是由其供给“新闻”的动机决定的。一般地,供给观念形态的“新闻”,是为了思想启蒙或开通风气;供给消息形态的“新闻”,是为了反映社会或提供资讯;供给知识或常识形态的“新闻”,是为了普及知识或介绍民俗;而综合地供给各类形态的“新闻”,则是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而“新闻”形态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就回答了报人“为什么”与“为谁”供给“新闻”的问题,体现了报人是否要负起“环境的监视”的任务,这个任务被日本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新井直之认为是新闻事业的

① 沟口雄三:《公私》,郑静译,载陈光兴、孙歌、刘雅芳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0年,第53~55页、73页。

② 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③ 本尼戴托·克罗齐:《历史与编年史》,高恒译,赵鑫珊、张金言校,载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8~410页。

④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89页。

“首要任务”<sup>①</sup>。

“新闻”来源与对“新闻”形态的选择也有密切的关系。报社需要何种形态的“新闻”,就会采用相应的“新闻”来源。观念形态的“新闻”,多由报刊确定主笔或撰稿者,或从社会来稿中选择;而消息形态的“新闻”,则可能派出访员,或从通讯社获取。戈公振在撰著《中国报学史》时就指出,“今报纸所载之新闻,大半得诸通信社”<sup>②</sup>。

对“新闻”的认识和对“新闻”形态的选择,构成了办报人的办报宗旨。如何供给“新闻”才能被大多数读者接受,才能被更多的读者接受,从而实现办报宗旨,则是技艺层面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这里既有“新闻”呈现的形式问题,也有“新闻”作为信息的传播渠道和网络问题。“新闻”呈现的形式,有整体报刊的印刷质量、版面设计、栏目设置,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或周期性安排,还有具体形态的“新闻”呈现的文体、图表及图文数量与配合,更有不同报刊间的总体配合。“新闻”传播的渠道和网络,与报刊的营销和发行不完全相同。报刊的营销和发行,只是传播渠道和网络的一部分。近代报刊营销和发行的能力,取决于办报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大小和交通运输条件。人脉资源丰富,交通运输便利,往往能使“新闻”以较快的速度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网络。政府的派购、学校和社团的订购都需要人脉关系支持,这需要办报人与相应的利益集团保持一定的关系。铁路、近代航运、航空运输所提供的运输条件为近代邮政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为乘客的携带远行提供了便利。乘客的便携行为和邮政事业的发展为“新闻”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闻”传播渠道和网络,还要考虑到二次传播的问题。报刊之间的转载、读者之间的传播,都是值得关注的。报刊之间的转载,有可能使“新闻”进入另一个传播网络,还有可能形成舆论和热点。读者的接受方式,会形成不同的二次传播渠道,近代的读报活动、阅报室或阅报社以及对“新闻”的街谈巷

议,都是“新闻”的再传播。供给“新闻”的最佳效果是形成公众舆论和社会热点。“新闻”呈现的报刊之间的配合和转载、二次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往往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热点形成的机制。

办报人为了实现办报宗旨而供给“新闻”,这里有没有一个度?也就是说,供给“新闻”是不是自由的,会不会受到若干因素的限制?我以为,经济上、技艺上都会形成相应的限制,宏大的“新闻”供给谋划,需要有经济实力、技艺水准的支持。超出以上支持能力之外,“新闻”供给的谋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还可能有政治上的限制。如果办报宗旨与政治制度不符,报刊就是“不合法”经营,“新闻”的供给就很难实现。在此情况下,“新闻”的供给就需要策略了,其呈现的方式和传播的渠道就有别于正常的情形,可能会有更多的经济投入。否则,报刊的生存就受到威胁。因此,供给“新闻”的自由问题,是近代报刊史研究应该注意的。

供给“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根本性的制约因素,那就是读者。因为近代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一个过程,近代报刊的功能性存在形态就有一个由报人的喉舌到公民言论机关的转变过程。因此,供给“新闻”的自由还受到读者接受能力、接受意愿和接受偏好的限制,这需要报人的努力和报人的策略、战略谋划。“新闻”始终是不自由的,唯其如此,人们才会争取“新闻”的自由。

形成公众舆论和社会热点,报刊才有经济上更多的收益。从经济层面来说,报刊获取、加工、供给“新闻”,都会有相应的投入。投入之后,是否有相应的回报(如扩大的发行量、增多的广告收入、增加的各类捐款),并获得盈利?这就有一个报刊经营管理的问题。即便某些报刊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还是有投入的管理问题、经费的来源问题。中国人总以节俭为原则,各环节的投入应有一些考量和规定。“合法”经营与“不合法”经营的报刊,其内部的管理制度肯定是有区别的。“报业的经营管理是报纸工

①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259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89页。

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办好报纸服务。”方汉奇指出:“研究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的历史,本应该是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却往往被人忽视,成为一个弱项。”<sup>①</sup>

作为“新闻史”的近代报刊史,我以为应包括以上内容,这些内容我概括为报刊的“新闻思想史”、“新闻供给史”和“经营管理史”。“新闻思想史”就是办报人对办报宗旨的认识,这包括对“新闻”概念的认识,对“新闻”形态的认识,对“新闻”形态选择的认识。“新闻供给史”包括“新闻”的媒介呈现、“新闻”的媒介传播渠道和网络、呈现和传播的效果(公众舆论和社会热点)、供给新闻的自由问题。“经营管理史”则是从内部管理与制度建设的层面去考察办报经费的来源、投入与收益。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作为“新闻史”的报刊史研究的基本面。没有这三个基本面,报刊史仍然是独立的报刊史,或者只是“革命史”的一部分,而与“新闻史”有一定的距离。

作为“新闻史”的报刊史,又被学者们视作文化史。中国新闻出版社在1985年重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时介绍说:“《中国报学史》作为文化史范畴的第一部报刊史专著,也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sup>②</sup>日本人小林保曾翻译《中国报学史》,将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于1943年由东京人文阁出版,列为《支那文化丛书》之一<sup>③</sup>。

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与作为“新闻史”的报刊史,是应该有所区分的。研究的视角当有所不同。麦克卢汉说:“媒体会改变一切,不管你是否愿意,它会消失一种文化,引进另一种文化。”因此,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首先要研究的课题就是,近代报刊使什么文化消失,又引进什么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应该关注小报,它是近代都市通俗文化的鲜活记录。近代各主要城市,甚至南方的一些

中小城市,都办有自己的小报。它不以登载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新闻为主,而以登载文艺作品为主,熔新闻、评论、文艺、知识、娱乐、地方掌故于一炉,最贴近城市市民生活<sup>④</sup>。更为重要的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在近代中国既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作为文化史的近代报刊史应该重点探讨报刊是如何呈现这种现象,如何参与这个过程。总之,报刊塑造文化的历史应该得到重视。

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不只是研究报刊塑造文化的历史,还需要研究报刊自身的文化史。报业,作为一个行业,有其行业文化;报刊经营企业,又有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报业的商事习惯和行业管理制度,报业内部的文化活动和报人之间的礼尚往来,构成了行业文化的基本内容。而报刊经营企业内部的文化活动、员工福利、规章制度,则构成了塑造企业精神的基本方面,企业文化以养成符合办报宗旨的企业精神为最高目标。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凝聚着近代报业的精神,只有深入理解了报刊自身的文化,才能深刻地探讨报刊塑造民族文化的历史。如有资料的条件,开展报刊自身的文化史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报业的文化精神往往是一些报人思想和精神的体现、放大和扩散。因此,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还应关注作为“文化人”的报人或办报人的研究。在一些学者眼中,对报人的研究是放在知识分子研究的视域中的。如有学者认为,《大公报》作为经济独立的民间报纸,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论说评述,是中国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言论机关<sup>⑤</sup>。在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痛于外患之凭陵,内政之腐败,国亡之无日,认识到非革新不足以图存,然手无权柄可操,遂致力于办报,借报纸传播其主张,以言论觉天下。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应当

①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序”第1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重版说明”第1页。

③ 戈宝权:《回忆我的叔父戈公振(上)》,《人物》1980年第4期。

④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⑤ 贾晓慧:《〈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序”第2页。

“展现报人言论救国之精神”<sup>①</sup>。在戈公振看来,这种“言论救国”还应体现在报人要争取言论自由,代表舆论,为建设民主政治服务。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sup>②</sup>

由此看来,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的存在,不能只是因为报刊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而应是因为有其实实在在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内容。当然更期待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将报刊史作为媒介史来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的大众传媒,主要是印刷文字的报刊”<sup>③</sup>。从媒介史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

一是作为媒介的技术史。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报刊各环节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新闻”更多、更快、更好地进入传播网络。但技术的进步有时会要求更多的投入,这有可能加剧行业的竞争。一般地,为了更好地供给“新闻”,报刊的采、编、校、排、印、发都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和流程管理,并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些技术和流程如何发生变化,变化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着“新闻”的供给及其效果?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但这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见。

二是媒介之间的互动史。报刊技术和流程变化的原因中,就有媒介之间互动的因素。这种互动不只是报刊作为现代媒介与传统媒介的互动,还包括现代媒介之间的互动。不同的媒介有自身的技术特点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其供给“新闻”有相应的技术要求。应该说,有些媒介技术是相通的,在一种媒介中首先使用的技术,其他媒介可能会竞相仿效。有些技术不能仿效,也会促使其他媒介寻求技术革新的路径。因此,媒介互动常是媒介技术进步的动力之一,媒介之间的互动史是不可少的。报刊属于现代媒介的范畴,中国近代依然是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并存,现代媒介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报刊作为近代新出现的媒介,它可能受到传统

媒介如告示、揭帖等的影响,而告示、揭帖等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告示、揭帖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通过张贴和人际传播进入传播网络,还可能登载于报刊,扩大传播网络。而报刊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应当是媒介之间相互影响和竞争的结果。现代媒介有多种类型,在近代出现的就有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等。新井直之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新媒体<sup>④</sup>。每一种新的媒体的出现都会对其他媒体有一定的冲击,迫使其他的媒体采取相应的对策,对报刊的“新闻”供给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作为“媒介史”的报刊史的研究,如能注意到媒介之间的互动,有可能将报刊史某些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展现报刊史的宏大场面。如近代公众舆论的呈现,不只是报刊舆论,它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遍布各地的告示、揭帖,可以表现为民间文艺形式和集会演说,还可以表现为公电、公函、公呈,到后来甚至还可以是不断播报的电台新闻、电影专题片、广播和电视节目。因此,能够展现不同媒介对同一论题的相同声音或普遍关注,是论证公众舆论形成的更有说服力的途径。

三是媒介社会史。新媒介的出现往往会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近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媒介的不断进步和发达。因此,研究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媒介的要求都有助于理解媒介存在的社会意义,也是我们现时代研究报刊史或媒介史的真正时代价值。

总之,近代报刊史从新闻史、文化史、媒介史的视角去研究都应有特定的内容和学理所在,这些内容究竟包括哪些方面,这些视角的学理究竟是什么,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简而言之,我的本意是,“新闻史”的报刊史应有“新闻史”的品味,“文化史”的报刊史应有“文化史”的韵味,而“媒介史”的报刊史则应有“媒介史”的风味。

①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前言,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90页。

③ 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9~27页。

④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258~259页。



## 报刊史与学术史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学术是文化的精华。中国学术有其深厚底蕴和独到传统,从古典时代延续至今,历史悠久,成果丰硕,目前仍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术史的相关著述不断问世,触角深入到不少领域,甚至大有取代传统思想史研究之势。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报刊亦是文化发展的结晶,有其自身的演进路径和特色。对于中国而言,报刊更多地是个舶来品,其发挥作用的节点是在近现代,且已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取材对象,甚至报刊史本身也成了学术热点。学术和报刊相逢,学术史和报刊史相遇,会带来怎样的效应,会对彼此的路径、视野、方法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报刊的出现和刊载内容的日益多样,使得学术作品的呈现形式和社会影响皆发生很大变化。在报刊流行于中国社会之前,学术研究成果的书面表达主要是依托于书坊或个人刻印的文集以及学者之间的论学书信、札记等,局限在一个颇为狭小的圈子里。而报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后,刊载于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既有丰富多彩的新闻报道,又有或深或浅的知识介绍,甚至逐渐开设一些专栏,刊发文化、学术类文章。随着报刊种类的增多,登载学术作品的报刊越来越多,学术的表现形态较之以往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影响力也今非昔比了。甚至可以说,报刊对中国古典学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助推作用。与传统的文集、书信、札记等相比,依托于报刊的学术作品既在体裁体例上趋新,西化色彩浓厚,又在规范性方面向现代学术靠拢,而且报刊的时效性、阶段性等特点也影响到学术写作。报刊上学术作品的定期发表和学术话题的渐趋集中,亦促进了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特别是报刊舆论和学术热点的互动,对学术的社会化起到

很大推动作用,学术的社会影响力激增。对学者而言,报刊往往是他们发表学术成名作的首选,如梁启超之于《新民丛报》、刘师培之于《国粹学报》,等等。可以说,近代最前沿、最尖端的学术作品大多载于报刊之上。

正因为报刊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所以学术史研究者极为重视报刊,将其视为重要对象。不过,学术史研究者所看重的主要是报刊所发表的学术作品,而非作为载体的报刊本身,即报刊更多的是学术史的取材对象和史料源泉,而非研究对象。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显然有些狭窄。学术成果有其内容和载体,取其内容作为主攻对象是合理的,但同时不能忽视载体本身,载体往往能形塑内容,报刊就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不研究报刊本身,学术史等于瘸了一条腿,所以学术史非常有必要将报刊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另外,要使学术史健全起来,报刊史的研究路径、视野、方法、成果等也可提供诸多借鉴。如报刊作为新闻传播的重要平台,其报道有强烈的时效性,“当下”是时效性的限制。针对这个特性,报刊史研究极为注重时效性这一维度。对学术史来说,同样存在时效性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以报刊为载体的近现代学术成果。如若将报刊史的研究取向、路径、方法等借用过来,至少当能更清楚地观察时效性的学术成果,更理性地分析学术史上的趋时现象,从而更清晰地看待学术发展历程中的短暂与恒常。再如,报刊报道往往有鲜明的针对性,或针对某读者群体,或针对一定地域,所以报刊史研究常常以此为着手处。这对学术史也有启示,不仅是以报刊为载体的学术成果受制于报刊的这一特性,一般学术成果也大多有此特性。学术史研究若亦由此着手,当在以往对学科、学人、学术著述等方面

的研究取得丰厚成果基础上,开辟学术受众研究、学术传播地域研究等新的领域,从而进入一片新天地。

对于报刊史研究,学术史亦可贡献良多。学术史研究学科、学人、学术著述时,一方面强调严谨求实,深入细致,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在文本分析上下大气力,看重所谓内在理路的探索;另一方面重视语境分析,对学术话语所由产生之学术派别、学术制度等因素进行具体探讨,即在外在理路上下工夫。这样的路径与方法对报刊史研究当有所启示。记者对时事的客观报道和求实作风,与学者探讨问题时的理性客观和严谨精神是相通的,由此产出的新闻作品和学术作品也就有了共性,报刊史研究者在探讨报刊文本时便可借鉴学术史的文本分析理路,尽可能依托最为丰富的报刊资料,作严谨求实的分析。另外,学术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而不同学术流派的出现,标志着学术走向发达。对于报刊的成长与发展来说,情形大体类似。所以,学术史的外在理路分析法同样适用于报刊史。当然,学术史研究者在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历程时,还要关注中国学术的某些特色,如抓住学者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师承)关系三大要素,就能对中国学术有较为贴近的理

解,也能对中国学术的精微之处体会于心。报刊何尝不是如此,尽管已处在近现代的社会氛围下,其从业者同样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师承)关系的笼罩之下,报刊的风格、倾向、派系色彩等等,大体不离这些中国元素的制约。故而这些因素应是学术史与报刊史共同关注的对象,需进入报刊史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还需指出的是,学术史可从多个层面界定,其概念有广、狭之分。具体到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也都有各自的学术史或学科史。报刊史作为后起之秀,发展十分迅速,已积累起非常丰硕的成果,目前,总结自身的演进历程,探讨自身的学术史,正逢其时。这种探讨正是在报刊史与学术史的交汇处做文章,需要两方面理论、视野、方法的融合。另外,学术史的功能之一便是引领后来者进入学术,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学术的方向感。对于报刊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史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无论进入报刊史的哪个领域,都要首先熟悉这一领域的学术史,从而才能在前人的肩膀上开辟出新方向,否则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处于学科前沿地带,甚至会陈陈相因,拾人牙慧。正因如此,报刊史研究者应该具有学术史素养。当然,其他学科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亦应如是。

责任编辑:张朝胜